

深圳發展是香港機遇 雙城同做大灣區引擎



習近平主席的深圳講話對於加強港深合作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深圳發展和香港投入密不可分，每個階段都可找到新的合作基礎和重心。跨入新時代，港深同是大灣區重要引擎，港深合作共同帶動大灣區發展，助力企業協同發力，做大做強引進外資技術、擴大開放的連接點，必將有利於大灣區更

快集聚資源要素，成為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香港未來在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中，更應以規則機制銜接為重點，在科技創新、金融融通、民生便利等合作領域取得突破。這不僅為了提高大灣區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更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堅實基礎。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高度肯定了深圳經濟特區改革發展事業取得的成就，提出一系列事關深圳未來以至大灣區建設的要求和期望，為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指路引航。對於與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中央有關深圳發展的重大支持行動，同樣引發香港社會各界的熱切期待。

港深每個階段都有合作基礎和重心

40年的改革開放歷程，深圳經歷了由粗放到精細、由山寨到創新深刻蛻變。中央當下對深圳的經濟發展寄予更大期望。習主席的深圳講話，充分肯定了深圳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並提出與時俱進全面深化改革、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改革試點、以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國家發改委前日公布了深圳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單，涉及要素

市場化配置、營商環境、科技創新、對外開放等六大類共40條，賦予深圳更多大展拳腳的空間。

深圳的改革機遇，也是香港的發展機遇。回顧港深合作所歷經的不同發展階段，深圳發展和香港投入密不可分，每個階段都可找到新的合作基礎和重心。現在，深圳作為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的親密夥伴，又與香港並肩為大灣區兩個中心城市、重要引擎，在新一輪改革開放推進港深合作更上階梯，為大灣區築牢更堅實開放中基礎，對香港尋求經濟新增長點、自身更好發展，具有相得益彰、互成成就的特殊意義。

港深合作共同帶動大灣區發展

香港要緊抓國家發展機遇，大灣區就是香港融入國家大局的主要平台。面向未來，粵港澳三地須致力於深度融合，提速珠三角城市和香港之間的銜接和對接，減少人員、貨物、資金和資訊的跨境流動限制。習主席的深圳講話，要求積極作為深入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推動粵港澳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平。香港未來在大灣區的協同發展中，更應以規則機制銜接為重點，在科技創新、金融融通、民生便利等合作領域取得突破，用好「一國兩制」制度優勢。這不僅為了提高大灣區經濟創新力和競爭力，更為「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奠定堅實基礎。

應該看到的是，深圳和香港是國家兩個對外開放的前沿城市，對帶動大灣區整體經濟發展、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高效運作，具有強大的輻射作用。深圳先行先試，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創新發展的時代標杆，40年間，諸多外資企業來到深圳安家落戶，見證了深圳對外開放的堅定步伐。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具有深厚的海外商業網絡和海外運營經驗優勢，長久以來為大量外資企業「走進來」和內地企業「走出去」提供服務。跨入新時

代，港深同是大灣區重要引擎，港深合作共同帶動大灣區發展，助力企業協同發力，做大做強引進外資技術、擴大開放的連接點，必將有利於大灣區更快集聚資源要素，成為國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

港深聯手再創經濟奇跡

香港的服務模式和對外銜接過去是深圳學習和模仿的對象。今天，深圳GDP超越香港，在產業布局、科技創新及世界五百強企業進駐等各方面已走在全國甚至國際前列。深圳的發展同樣值得香港借鑑。香港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正逢其時，必須堅持換位思考，以互利共贏的合作理念和胸襟，攜手深圳通過融合發展和大灣區市場一體化建設，將兩個重要引擎為大灣區轉化更多正能量，定能在與時俱進全面深化改革、銳意開拓全面擴大開放的新天地再創經濟奇跡！

司法改革關鍵在於接地氣



何君堯 立法會議員

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德在7月17日剛評論過，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可能不會繼續擔任香港終審法院法官。澳洲籍的施覺民在9月2日以類似理由辭職了，苗禮治勳爵也說因年事高，日後不會來港審理案件。如此種種事件之後，特首林鄭月娥又任命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賀知義，為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我們是否有評估過來自「五眼聯盟」國家的非常任法官集體辭職的風險？

筆者認為，香港需要一場司法改革，而其中關鍵在於接地氣，不僅在選任和提拔法官上，有必要考慮任命其他實行普通法地區的法官，而且法官的表現也需接地氣，既要受得住市民的批評，做事亦要公平公正。更要因應香港回歸以來發生的種種變化而考量與時俱進。當下的香港，司法改革應由上而下，改革團隊組成年輕化，給予海外法官培訓、加強對基本法和內地司法的認知。真正做到讓公義彰顯人前、讓法治成為常態。

選任法官前應綜合考慮

目前海外的非常任法官人數竟然超越本地常任和非常任法官多接近一倍，而年齡方面

也顯得十分老態，對香港回歸後帶有中國特色的普通法發展，究竟會有多大的貢獻呢？更何況，目前所有海外非常任法官都是來自英國、澳洲和新西蘭這些普通法國家，在「五眼聯盟」不斷圍堵中國之下，如果這些法官集體辭職，香港又該如何應對？其實，目前正是時候考慮任命其他實行普通法地區的法官，例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這些地區同樣中西文化薈萃，當地法官可以更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更接地氣。

另外，終審法院現只有4名常任法官，這並不足夠，至少需要6名才能應對現有的工作量，這也是需要進行改革的。香港還需要設立量刑委員會，英澳等普通法地區皆有設置量刑委員會對法官量刑標準進行指引，這並非干涉司法獨立，而是增加法律本身的公正及促進量刑過程的透明度，從而確保法律的公正和公眾的利益。

法官表現也需要更接地氣

香港前終審法院法官烈顯倫，已經不下多次批評高院有縱容濫用司法覆核之嫌，事實上，司法覆核數量已從回歸前的百多宗，演變成今天動輒數千宗的申請，其間不乏有人怨惡。而

司法機關似乎依然堅持自我，又或是無力作出改變。香港司法機構應作出積極檢討，提高司法覆核的接納門檻。

此外，香港法院及法官依然處於一個高高在上的地位，在判詞方面使用的法律文字極其拗口，晦澀難懂，而這也是回歸至今依然保留的殖民統治社會特點，利用語言及專業屏障，將精英管治與普羅大眾區隔。作為高深法律人士，更比任何人明白言簡意賅的重要性。寫判詞並非寫博士論文，必須要有其實用性！

筆者認為，在判詞上需要由上而下的指導，形成標準，準確切入問題而不做扭捏，少進行無關痛癢的討論。將判詞現代化，提煉出以往案例的精髓，並將其廣泛化，這樣不單可驅使司法的精簡發展，更有助於形成公益，達到及時之效，亦可提倡公民教育目的，這才是為民服務的精神。

普通法體系的一條重要的原則便是法院不僅要執行公義，更需要讓公義清楚地彰顯人前。尤其是最近一段時間以來，眾多具有爭議性質的案件判決以及市民對司法體系的批評，深刻證明了香港司法體系需要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刻不容緩，以維護香港良好法治這一寶貴的無形資產。

融入灣區建設 實現人生夢想

蘇暢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港區委員

習近平主席在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活動上發表重要講話，對深圳未來發展提出了更高層次、更高目標的要求。我認為，習主席的講話不僅是對過去40年深圳改革開放輝煌成就的總結和肯定，而且為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指明了方向。更重要的是，借這個特別的場合向全世界作出若干方向性的重要宣示：通過深圳的發展和成就，宣示黨和國家所擁有的顯著制度優勢和強大執政能力，宣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生機和活力，宣示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和嚴峻的風險挑戰下我們不畏浮雲遮望眼，繼續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與世界各國攜手合作發展的決心。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給全國人民提振了信心、增添了動力。

深圳擁有「特區、灣區和自貿區」三區疊加

的優勢，又有一批實力雄厚的科研機構和頂尖的科創企業，加上完備的產業鏈和扶持政策，相信《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的實施必將加快深圳「先行示範區」的建設。透過深港全面合作，充分發揮優勢互補，必將達至共同發展。

在當前的困境下，香港要再出發，就必須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按照「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原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本人認為，全面推進深港合作，將是香港的新出路。

習主席強調，「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可

見，習主席的講話，不僅給予深圳更高層次的經濟發展期望，也賦予其更多的政治期待。事實上，深圳作為粵港澳大灣區內最重要的創新引擎，具備持續吸引香港青年到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和生活的有利條件，也為香港青年發展個人事業、成就人生夢想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可以為港澳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作出新貢獻。

期望深港兩地政府能攜手合作，創造更多有利條件，促進兩地青少年的交流合作。在疫情可防可控的前提下，推出更多便利措施，鼓勵香港青少年到大灣區交流學習、創業就業，培養對祖國的認同感、歸屬感和向心力。作為香港青年，應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服務國家、貢獻國家的旅程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夢想。

諾獎評委再次識破美政客伎倆

江樂士

10月9日宣布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為世界糧食計劃署(WFP)，以表彰其「為戰勝飢餓所做的努力，為提升受衝突影響地區實現和平的條件而作出的種種貢獻，及其為制止有人利用飢餓挑起衝突、發動戰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2020年，共有包括211名個人和107個組織在內的318個候選人獲得提名，到底有誰獲提名或組織獲得提名，原本應保密至少50年。然而，出於政治原因，今年某些被提名者的身份卻被刻意洩漏。美國一些卑鄙政客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顛覆諾貝爾的崇高理想，公開被提名者的身份，這個問題困擾諾貝爾委員會已經多年。

2018年1月31日，美國參議員魯比奧(Marco Rubio)夥同美國國會議員史密斯(Chris Smith)致函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瑞斯-安德森(Berit Reiss-Andersen)，提名

參與2014年在香港搞街頭暴亂的幾位搗手角逐2018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兩位議員是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的聯合主席，該委員會致力於惡搞中國，不斷杜撰和散布抹黑香港的虛假資訊。兩人向安德森表示：諾貝爾和平獎應頒給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以表彰他們為推動香港政制改革及自決而作出的種種和平努力，還稱此三人捍衛「和平與自由」。

事實是，這三人均因暴力傷害他人而被定罪，其所作所為全無「和平」可言，可是盧比奧和史密斯對此卻隻字不提。2014年9月26日，三人在金鐘的政府總部東翼前禁區組織非法集會，並於2016被判罪成。從此案審判時提供的證據來看，他們策劃、煽動數百人闖入政府總部前地的禁區。此外，2017年，終審法院在審查了他們的所作所為之後，裁定其罪行為「大規模非法集會，事件涉及暴力」，但

這些情況，兩位美國議員都沒有報告給瑞斯-安德森主席。

所幸的是，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早已看穿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的伎倆。近年來，人們一直擔心諾貝爾獎會被政治化。2001年，諾貝爾獎始人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的家族成員邁克爾·諾貝爾(Michael Nobel)表示，委員會時常違背創始人的意願。但是，通過向世界糧食計劃署授予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諾貝爾委員會不僅嘉許了真正作出貢獻的機構，也向世人展示出它有決心維護創始人的本意、繼承其遺志。既然總有像美國國會中國委員會之流為謀取政治利益而破壞諾貝爾的理想，那麼諾貝爾委員會就不容放鬆警惕，絕不能讓此輩得逞。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英文原文發表在《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上。有刪節。)

許楨 教授 香港智明研究所研究總監



在當代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史上，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是濃重的一筆。深圳發展之初，不過是數十平方公里的一個南粵小鎮，今天不僅成為東亞最大城市經濟體之一，更培育出眾多世界級科技企業。相對於深圳的經濟體量，其發展模式、產業結構，或許更加值得重視和研究。

回首過去40年，深圳的上升軌跡，其實也有着幾許起伏。十餘年前一篇「深圳，你被誰拋棄」，亦曾一度引起熱議。今天，我們就更有條件、也更有必要，重新審視深圳崛起的過程，尤其是其起點。有意思的是，我們習慣將同一時期的深圳與香港作比較，或橫向分析兩者的社會、經濟關係，而較少作縱向的、城市發展史上的對比。

香港社會的黃金時代，經濟發展的高峰在於1980、90年代。以此為基點倒推，我們發現，1950到60年代，大量移民匯聚香港；1970年代，英國工黨政府大力推動香港基建；以及本土出生、成長、受教的新一代成為生產與消費的生力軍——三點結合成一線，成為香港成功故事的底蘊。

深圳的歷史背景和政經定位，和香港完全不同。然而，從發展元素看來，卻和戰後三四十年的香港故事，頗為近似。須知道，在廣東省內外，和深圳同時推進的經濟特區就有多個，遍及東南沿岸，其後還有海南省。因此，在政策以外，應該還有決定性的市場、社會及文化因素，最終，譜寫出深圳的故事。

自1980年代始，大量移民就一波接一波湧入深圳，這些移民來自寶安、惠州、東莞等周邊縣市，乃至全國南北的工人、個體戶、專業及行政人員，與此同時，深圳市委與負責蛇口工業區開發工作的交通部招商局，也推動各式基建。直到今天，當年開發的深南大道、蛇口港、赤灣港、南山科技園區，仍然起着戰略樞紐作用。其他，隨着深圳市區持續往鹽田、龍華、龍崗等地拓展，也就容納了更龐大、更年輕的人口。

可見，深、港城市發展有着相近的根本因素，能否持續吸納外來人才，維持人口的年輕化，就決定了兩城發展的持續性。

穆家駿 中學教師 全國青聯委員 青年民建聯副主席



青島市自10月11日市內出現本地新冠肺炎不明源頭病例後，短短5天內，完成全市核酸檢測，1,089萬個檢測結果出爐。這樣的「中國速度」，連立場偏頗的美國媒體CNN也讚不絕口，坦言美國不可能如中國這樣能在如此短時間內有序進行全民檢測。

回看香港9月1日起為期兩周的自願性檢測，從籌備至開展已經花了1個月，到真正落實檢測又用了兩個星期，效率之低完敗於青島。而且整個計劃花了納稅人5個億，還沒加上中央另外津貼的5個億檢測費用。全港700多萬市民中，只有178萬人自願參與，結果未能徹底斬斷病毒社區傳播鏈，致使本地源頭不明確診個案依然在香港不時出現。

在本地確診個案源源不絕出現的情況下，特區政府居然計劃與11國研究「旅遊氣泡」，當中不乏一些依然疫情嚴峻的國家，比如德國和法國，這兩個國家分別在過去的14天內新增確診個案多達45,000宗和21萬宗。在這些國家疫情如此嚴重的情况下，為了經濟發展，重開旅遊對於香港整體防疫是利多於弊嗎？

今次全球面對新冠疫情，中西方的思維、治理模式有了一次直面的比較，中國每次發現本土病例，無論是之前的北京、烏魯木齊還是今次的青島，採用的都是全民強制檢測，把不明源頭個案在極短時間內全部查出，有效壓制疫情進一步爆發。而且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合全國之力去支援一地，同時在思維模式上強調團體利益高於個人，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受到影響，但只有盡快解決疫情才能再次放開限制，讓市民恢復正常生活。相反，西方模式強調個人主義，往往因為自由，連強制佩戴口罩都被人指責剝奪個人自由，更遑論要實施強制性的全民檢測，因此疫情依然一波接着一波發生。

香港有祖國強大的支援，因此有必要吸取教訓、積極籌備在第四波疫情爆發之前實施全民強制檢測，在沒有本地個案清零之前，所有的「旅遊氣泡」可能只會再釀成下一波疫情的爆發。

深圳茁壯發展的根本因素

全民強制檢測是防疫不二法門